

## 唐代游侠小说简评

褚荣昌

如果说唐代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地位,那么唐代游侠小说则在唐代小说领域中占有了一个重要席位。

唐代的游侠小说流传到今,大都收录在宋初所编的《太平广记》之中,从卷 193 至卷 196 四卷共 25 篇,除去唐以前及唐以后个别篇目以外,绝大多数是唐人作品,就内容而言,这些作品大致可分或下列四类:

第一类是描写游侠之士以他们的精湛武艺对抗统治者皇帝和贵族官僚,描写他们武艺超群,任侠仗义,敢于蔑视官禁之严,法律之威破坏统治阶级的现有秩序。这一作品的代表有《车中女子》《嘉兴绳技》(均选自皇甫氏的《原化记》)《田彭郎》《潘将军》(均选自康骅的《剧谈录》)例如《车中女子》一文,叙述吴郡举人入京应试时遇到一群侠客,为首的是一个妙龄女郎。这帮侠客都有绝技:“有于壁上行者,也有手撮椽子行者,轻捷之戏,各呈数般,状如飞鸟。”他们向这举人借马偷盗宫廷宝物,而当这位士人被牵连入狱时,这个女子能够“如飞鸟下”,进入狱中,以绢缚其身,“耸身腾上,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这个女子蔑视朝廷和法律尊严,敢于偷盗宫中宝物,而且敢于从宫城牢中将“朝廷要犯”救出来,凭她的高强武艺与封建统治者相对抗,反映唐代游侠“以武犯禁”的一个侧面,是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牢笼的反抗者的形象。类似的作品还有《田彭郎》。田彭郎是个“市廛军伍”亦即普通士兵。他敢于偷盗皇帝的希世之宝“白玉枕”,使得皇帝“惊骇移时”。说道:“一枕诚不足惜,卿等卫我皇宫,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环卫,自兹无用矣!”这一偷盗皇帝寝殿内白玉枕的行为引起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当他们用计抓住田彭郎时不得不承认:“引乃任侠之流,非常之窃盗。”他们害怕游侠威胁他们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敢于冒犯宫廷、大臣的侠盗都是居于下层的普通百姓,田彭郎是个下层士兵,另一

个是连名姓也未著录的年青女子,他们都有惊人武艺,但不凭武艺求官,不与统治阶级合作,隐身江湖,不满朝廷,用盗取统治者宝物的方式戏弄统治者,这是普通百姓反抗意志的表现。

第二类作品是描写游侠任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人民排难解纷,救人困厄的故事。这一类作品可以《宣慈寺门子》为代表。描写一个宣慈寺庙的看门人对那些为非作歹的贵族少年“骄悖之状,旁若无人”的态度不能容忍,在一帮有身份的读书人“骇愕之际”敢于挺身而出,痛打那帮纨绔子弟,这在门第等级森严的唐代社会中来说,这一行动无疑是勇敢的。更为可贵的是,这位看门人凭着他的一股凛然正气,全然不把封建尊严放在眼里,当他猛打那位恶少时,“紫云楼门轧然而开,有紫衣从人数辈驰告曰:‘莫打!’他全然不顾。”接着是太监带了一帮子人来“驰马相救”,他拿起马鞭子乱打,“敕使亦为所撻”。晚唐太监势力极盛,连皇帝都怕他们几分,可是这位看门人全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敢于触犯他们尊严,这个看门人就是类似战国大梁城门监者侯嬴一类的人,是位隐居民间的游侠,类似这一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还有传奇《昆仑奴》中的昆仑奴,《柳氏传》中的许俊,《无双传》中的古押衙。此外牛僧孺撰的《玄怪录》中的《郭元振》也是这一类作品。

第三类作品是描写下层人民忍辱负重、报仇雪恨的故事。这类作品是唐代游侠小说中常见的题材,代表作品有《贾人妻》、《崔慎思》。这两篇作品故事情节大同小异,都是讲一个女子怀着亲人被害的深仇大恨,《崔慎思》篇写明女子的杀父仇人是个郡守,隐身在草野之中,为了掩护自己,嫁与陌生人为妻,表面上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贾人妻》中的女子是个小商人。作着“朝肆暮家”的营生,实际上时刻不忘报仇,一旦时机成熟,在一个月黑风高夜晚,凭着坚强意志

和高强的武艺,手刃仇家首级,然后远走高飞,这类故事表现了处在残酷压迫之下的古代劳动人民的愿望和理想,他们在亲人被杀,特别是被地方官吏或者豪强所害,无力报仇,在黑暗社会中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前途,只好寄希望于自己的个人斗争,远走他乡,投师学艺,忍辱负重,等待时机报仇雪恨。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故事的主人公往往是个女子,从而更加突出中国古代妇女的优良品质。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写的也是这样一类奇女子。清代《聊斋志异》中的《侠女》以及吕四娘、十三妹的故事显然是受了这类故事的影响。

第四类作品是写豪侠为统治者服务,他们或者是为藩镇或某一高官所蓄养,成为他们的鹰犬。如《红线》、《聂隐娘》,或者借豪侠故事宣扬“君权天授”为封建正统观念服务,如《虬髯客传》。唐代自中叶以后,藩镇割据,互相斗争,除了直接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斗争以外,往往蓄养死士、收罗亡命,开展间谍和暗杀活动,借以牵制和镇慑对方,这样便出现了一些为主子蓄养、知遇报恩、效忠尽命的豪侠之士,而当时神仙方术的盛行,又把这些侠士描写成上天入地、来去无踪、具有超现实的武艺,给作品蒙上神秘主义色彩,借以美化他们,增加统治者的威慑力量。晚唐作者袁郊的《红线》歌颂即这一类英雄,他所描写的红线女,实际是潞州节度薛嵩的女奴,后来因为她“善弹阮”深得薛嵩宠爱,薛嵩特别信任她,让她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号为“内记室”。红线因为薛嵩宠爱,过着富裕享乐生活:“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矣。”她对薛嵩这种恩宠,时刻不忘,表示“某虽贱品,亦有解主忧者”,要尽心为主服务“以示报恩”。书中详尽记叙了红线为主报恩的经过。当薛嵩获悉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蓄养死士准备袭击潞州时,红线女于半夜时分,只身潜入魏博节度使内宅,“抵其寝帐”在他的头边取了一个金合子而还。天明时又让薛嵩专派使节将金合送还田承嗣,告知“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头边获一金合。……”使田承嗣“棒承之时,惊惶绝倒,”迫使其取消攻击打潞州的念头。红线这一行动,表现了“士为知己者死”这一伦理观念,也是古代侠义之士奉为金科的行为准则。《聂隐娘》与之相同。也是一篇描写女侠为藩镇服务的作品,主题大体相

同,题材内容也无很大差别。红线为潞州节度使薛嵩排难解纷,聂隐娘先是为魏博节度使服务,任其“左右吏”,后又转投魏博节度使的对头陈许节度使刘昌裔的门下,转投的原因无他,只是“知魏帅之不及刘”,归根结蒂是侠客为高官作爪牙,供其驱使左右,开后代《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小说的先河。在内容上,聂隐娘的神秘主义色彩较《红线》更为浓厚,情节离奇,叙事荒诞不经,写剑术之精,乃至可以开后脑“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写与精精儿相搏是“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而“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火影,”神秘莫测,简直不知所云。这种荒诞描写与神仙佛道观念相结合后,更进一步蒙上神秘色彩,给后代描写神仙剑侠的武侠小说以极大影响。类似此类充满神秘主义剑侠描写的作品还有《僧侠》、《京西店老人》等篇。这些作品没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只在于“搜奇记逸”,通过夸张的描写突出武侠的超凡、神奇。如《僧侠》中的僧人脑袋上被人打了五个铁弹,毫不介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郎君莫作恶。”过一会儿从后脑壳摸出来还给射弹者。《京西店老人》中那个隐身草野其貌不扬的箍桶老人,竟然是个了不起的剑侠,他把箍桶用的木片一片片地抛向空中,如满天飞舞的利刃,“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鞠状势。”武艺之奇使人叹为观止,这种夸张的描写既是小说作者有意所为,也是六朝志怪小说传统影响的结果,而又开启了后代武侠小说的先河。

虽然游侠小说不少内容也往往事涉怪异,但与六朝志怪或志人小说的艺术表现方法上有本质区别。六朝小说,就志怪而言,仅是“搜奇记逸”,目的为“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如鲁迅所说:“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涂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至于志人小说,乃是“撮拾旧闻”,“记述近事”,不过“残丛小语”而已。而唐代小说却是有意识的创作,无论在艺术方法、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语言特色诸方面,都较六朝小说有重大突破,成为一代特绝之作,游侠小说典型地表现了唐代小说这一特点。